

我的音乐往事

李欧梵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书 名】 我的音乐往事
【作 者】 李欧梵
【出版社】 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5年1月
【ISBN号】 7-5343-6547-3 / I267
【定 价】 23.00元

自序

这本书看来洋洋大观，其实是一部增订本，内中包括我以前写的三本有关音乐的书：《音乐的遐思》（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音乐的往事追忆》（台北，一方出版公司，2002年）和新版《音乐的遐思》（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5年），另加最近为香港各报章杂志写的三十多篇音乐文章，合在一起，集成这本书，算是为自己多年来对古典音乐的热爱留下一个记录。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苏州大学的季进教授和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席云舒先生，没有他们二位的鼓励和督促，我也懒得做冯妇出这本书。然而，音乐毕竟是我一生的挚爱，没有音乐我也活不下去、写不下去。和玉莹结婚后，我发现生活更有意义了，我们一起过平常日子，当然更要有音乐“助兴”，所以我的音乐灵感竟然潺潺不绝，随时随地有如泉涌，而且写起来也更得心应手，几乎到了随“传”（约稿）随写的程度。我妻虽不懂音乐，却鼓励我听音乐，所以她也是我的“缪斯”（Muse）和知音，只要她对我莞尔一笑，说一声：“老公，你写吧，一定可以写出来的！”我就会立刻下笔不能自休，文字像流水或

马勒交响乐的旋律一样，源源不绝地流了出来，甚至充满了激情。有时候越写越长，最近竟然写成一篇讨论布鲁克纳的几千字长的文章，仍觉意犹未尽，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的日常生活也被音乐填满了：清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唱片机听音乐——从莫扎特的《弦乐五重奏》听到吉内特·内沃(Ginette Neveu)演奏的“绝版”小提琴曲；上班上课时，脑子里除了教材之外还是音乐，有一次为中大建筑系的学生讲维也纳的建筑文化时，竟然从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和阿尔道夫·路斯(Aldolph Loos)设计的房子讲到理查德·斯特劳斯的歌剧《玫瑰骑士》；下班回家，吃完晚饭之后，又是听音乐——不是到香港文化中心或大会堂去听香港管弦乐团或香港小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就是在家中客厅边听边看各种音乐的声碟和影碟，从阿巴多(Claudio Abbado)指挥的贝多芬和马勒到列文(James Levine)指挥的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后者还是在晚饭前就开始听，一直听到老婆叫我上床睡觉。甚至在入梦之前脑海中涌现的还是瓦格纳或布鲁克纳的旋律。用老婆的广东话说，这就叫做“线”！

在《音乐的往事追忆》的自序中，我曾提到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和他那种独有的琐琐碎碎、丝丝缕缕的法文长句子所营造出来的“过去”世界，但普鲁斯特的回忆源泉不是音乐。我的“现事”和“往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内心独白”皆充满了音乐，恐怕不亚于专业音乐家，然而偏偏我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音乐训练，唱不出口，只能听。也许脑子里积累的音符太多了，所以化成文字写了出来，但写成的文章却毫无文采或形式上的完整结构，那只能怪我自己没有这位法国大文豪的生花妙笔。而我又偏偏不会作曲，甚至连较复杂的乐谱也看不懂，因此也无法圆我“业余指挥家”的美梦。怎么办？只好听音乐，写文章。

然而我想像我这样的乐迷一定不少,否则也不会有出版社愿意为我出这类音乐书籍,它既非我的“正业”(文学),也非我的“学术著作”(甚至我的“乐评”也是玩票性质),我还不时收到不少乐迷读者的回应和乐团乐师的好评,认为我的论点颇为“中肯”。在这些读者和乐坛同好鼓励之下,我更觉得勇气百倍,看来今后还会写下去,说不定还会出二集、三集、四集,或“前传”,像《星球大战》或《蝙蝠侠》影片系列一样。

我发现自己随着年岁日增,越来越喜欢听音乐中的老经典和经典中的老版本。最近的文章中讨论的经典作品(如贝多芬、勃拉姆斯、马勒和布鲁克纳的交响乐)和经典诠释家(如小提琴家海菲兹、指挥家切利比达克、克莱伯和君特·旺德,皆是欧洲人)也特别多,而对于新音乐——如欧陆、美国或中国新起的作曲家和作品——则不够专注,只偶尔论及。我购买唱碟时更是专找老版本,所以香港中环一家小唱片行的老板娘一见到我进门,就会自动抱出一大堆重新包装的老唱片来任我挑选。我最近发现自己收藏的指挥家版本中最多的不是卡拉扬或萧提(Solti,或译做索尔提),而是切利比达克和弗特万格勒,而后者几乎全部是“原声道”的早年录音。如此下去——人老了,却往更老的经典版本堆中去“寻宝”——如何是好?

我妻看我一脸无可奈何却又自鸣得意的表情,又是莞尔一笑,轻轻地说一声:“老公,你看来还很年轻!”就在她这一声鼓励之下,我又完成了这篇序文。这本书当然要献给她。

2005年7月3日于大连旅次

目 录

第一辑 纸上漂过的音符

- 3 音乐的遐思
- 7 肖斯塔科维奇的“反讽”与“反抗”
- 14 赛义德与音乐
- 19 同性恋音乐家
- 23 音乐与小说
- 28 音乐电影·电影音乐
- 30 美国的《牡丹亭》与中国的《图兰朵》
- 36 《帝女花》与《阿依达》
- 44 古典音乐的召唤

第二辑 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

- 53 你一定要听马勒
- 60 马勒的《复活》

- 67 马勒的音乐盛宴
- 74 倾听贝多芬
- 78 “失恋”的勃拉姆斯
- 82 弦动我心
- 89 斯特拉文斯基：一个乐迷的礼赞
- 94 《弦裂》：一个音乐家的流亡故事
- 101 陈酒愈醇：听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
- 106 艺术奇才谢勒斯
- 109 带着音乐去天堂的人

第三辑 涉过乐海

- 123 三个时代，三种辉煌
- 132 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前世今生”
- 141 欧洲：激情的交响
- 148 中国乐团剪影
- 164 萨尔茨堡音乐节
- 178 冠盖云集：香港、澳门音乐节
- 187 切利比达克的“现象学”
- 191 德奥经典最后的掌门人
- 195 “如果罗西尼不够”
- 208 散珠零玉：中国音乐札记
- 217 受难的灵魂

第四辑 一个乐迷的音乐拼盘

- 225 语言终结的地方

- 231 四种记忆,四种音乐生活
- 241 选购经典唱片
- 247 漫谈音乐经典
- 250 一个乐迷的音乐拼盘
- 257 身体里的莫扎特
- 263 当我们还年轻
- 272 怀念我的父亲

第一辑 纸上漂过的音符

音乐的遐思

西洋古典音乐是我的业余爱好之一(另一个是电影)。据说有此种爱好的人不少,专业人士——特别是医生——更多,近年来随着音响技术的发达,镭射唱片录音渐臻佳境,中产阶级消费者中产生了一批所谓音响迷,音响和音乐加在一起,就产生了“发烧大碟”(录音特佳的唱片)和同有此癖的“发烧友”。

我大概可以算是“发烧俱乐部”的候补会员吧。拥有的“小碟”(Compact Disc,简称CD)虽然没有书多,但也有五百多张,而且每月经常“发烧”,往往在唱片行大减价时流连忘返,有时候更变本加厉,从一家唱片行走到另一家,满载而归后,在我的客厅里慢慢地把一张张小碟剪开(在美国,CD仍然包装在塑料袋或纸盒中),打开音响,小心谨慎地把小碟上机,于是,或雷霆万钧、或温柔绮丽的音乐就从两个落地喇叭中传出来。我的摇椅沙发的位置刚好和两个喇叭成三角形,我于是入座,两腿跷起,然后仔细阅读小碟盒子里的音乐介绍,读后闭眼逐渐进入忘我之境。

我的音响设备只能算是中高级,大部分是英国器材(因为我觉

得美国或日本的器材不够柔和),在我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也觉得满足了。我的喇叭有两个特点:低音温而厚,高音亮而纯。由于唱机不是超级产品,所以清晰度略嫌不足,但听交响乐绰绰有余,如果唱片发音效果佳——所谓“发烧大碟”——我听起来也足够过瘾,甚至发起烧来全身进入一种亢奋的状态(马勒[Gustav Mahler]的作品尤能使我如此)。不过,问题是,如果录音不好,我所想象的效果无法达到,或者更糟的是,有时候唱片杂志乐评家极力推荐的唱片,我买回来听,反而大失所望,浑身不适。非但无法渐入佳境,而且越听越觉得不是味道,甚至把一个乐章重复几次后,无法卒“听”,或勉强听完一次后大呼上当。这种不满足的情况是我最难忍受的,于是,我不知不觉走上音乐和音响“版本”之学的歧路。为了解除心灵上的痛苦,我势必要购买同一个乐曲的多种版本,反复比较,直到满意为止。但是,有时候若购得三四种版本后仍不满意的话,问题就更大了。情绪起伏不定,一方面不敢再买(已经浪费了不少金钱,而且成了家的人不应该再有单身汉的放荡),另一方面还想再试,于是又开始读音乐杂志、收集资料,甚至在收到一笔意外之财(譬如本文的稿费)之后,根据研究心得再买一个“最后”的版本。

我近年一贫如洗,愧对父老妻女,实在是受了我这个业余爱好之害。

不过,如果我需要为自己辩护的话,也自有一番似是而非的道理。

其实,我的专业(文学)和我的爱好(音乐)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有时候我感到读书和听音乐所得的“快感”颇相似,特别是小说和交响乐,其结构的对称性可以找到理论的根据:俄国理论家巴赫金(Bakhtin)所得出的“多声体小说”这一概念,就是一例。我个人在聆听音乐时,往往下意识地把它和文学的境界混在一起,反之亦然,

读文学的书,往往想到音乐的主题。唐诗和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Claude Debussy)的音乐,在我的脑海中就产生类似的效果(可惜我文笔生硬,不知道如何描述)。据说钢琴家傅聪也曾有过此种看法。初读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直觉地认为全书是一首弦乐四重奏,四个主要人物恰似四种提琴,在全“曲”的结构中作哲理和情感上的交融。而这部小说被搬上银幕后却面目全非,精致的四重奏变成了大而无当的交响乐,而且指挥者——导演的诠释全错了,不该有的重音却拼命加强,把整个小说的“轻”搬弄成使我难以忍受的“重”!观后浑身不舒畅。回家猛听雅纳切克(Janáček,昆德拉最喜欢的捷克作曲家)的两首弦乐四重奏,心情才逐渐平稳下来。

我授文学的课,往往作音乐的隐喻,学生听不懂,我更感到对牛弹琴,了无乐趣。浅显的例子学生比较容易接受,譬如,我每次重教鲁迅的小说,就说:“每一个指挥家,都想诠释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九首交响曲,经典作品可以容许不同的读法,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前后录制过三次贝多芬的交响乐,我也前后读过三次鲁迅的小说……”说着就自鸣得意起来。有时候文学作品互相指涉和反讽,就用巴尔托克(Bela Bartok)《交响协奏曲》中的一个乐段引用并讽刺肖斯塔科维奇(Dmitry Shostakovich)《第七交响曲》的例子,于是又可以把话题扯到文学与政治、乡土与现代、作品与诠释等大问题上去。

语言和现实不同,而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和社会现实的距离太近了:历史和社会文化的使命感或承担意识(所谓“感时忧国”的精神)固然重要,然而一个作家若没有自己的文学语言,仍然无法把意识变成艺术,或在个人艺术和集体意识之间找寻独特的出路。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肖氏的交响乐我又想到与他同时期的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交响乐和歌剧。如果肖斯塔科维奇在俄罗斯历史的洪流巨浪中试图作自我的见证,施特劳斯在德国历史领域中却毫无贡献,然而他在晚年对于艺术和人生的领悟——特别是他被历史抛弃之后(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纳粹党)——却自有一套看法,在乐曲中显现为一种日薄崦嵫的美感。我最喜欢他的《最后四首歌》(可惜没有一个版本令我满意,早期施瓦茨科普夫[Elizabeth Schwarzkopf]唱得最好,可惜她的唱片转录成CD后效果不佳,韵味全失!)。有一次在授课时竟然想到他的歌剧《玫瑰骑士》,灵感出自白先勇的《游园惊梦》。我问学生可曾听过昆曲,美国人当然瞠目以对,而中国学生(包括我在内)也不甚了了,那么如何解释白先勇笔下的“美人迟暮”的心态?那是一种什么境界?除了引用《红楼梦》和《牡丹亭》之外,我突然想到《玫瑰骑士》的元帅夫人和全剧最后一场的四重唱——啊,耳边乐声响起,卡拉扬的指挥棒在台下挥舞,台上呈现的是施瓦茨科普夫雍容华贵之像,她对镜自照,知道无法和年轻貌美的苏菲竞争。而年仅18岁的美男子奥克塔维杨和苏菲一见钟情,恰相匹配,于是独白、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接踵而来……唉,我认命吧:青春不再,人生如梦,人世全非。认命吧,我诚无冤孽!

我从忘我之境回到课堂中,年轻的美国学生们呆呆地瞪着我,看样子我又把话题扯得太远了,这是我讲课的老毛病,最近似乎更加剧了。

如何收场?只好煞有介事地说:“你们太年轻了,不懂得中年心境,更不懂得音乐!好,回去每个人买一套《玫瑰骑士》的唱片,先听选曲。版本有三种较好,20世纪50年代的卡拉扬版本比新的好,萧提(Sir Georg Solti)的也不错,还有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的,录音方面伦敦版较佳,不过……”

肖斯塔科维奇的“ 反讽 ”与“ 反抗 ”

音乐与政治热情

音乐与政治有无关系？从一个“ 外在 ”的立场而言，当然有，然而，音乐本身是否有政治性，却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只是音乐的爱好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以我的看法只能算作一个乐迷的主观臆想，不足为行家借鉴，但也许会引起其他乐迷的共鸣和争论。

音乐的效力可以激发人的政治热情，法国的国歌《马赛进行曲》和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然而，如果把这两首歌的歌词除掉，仅凭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是否仍能引人投笔从戎、参加革命？西洋古典音乐史上，不乏所谓“ 国民乐派 ”的例子，从俄国到北欧和东欧，不少音乐家都受其影响，认为作曲的目的是和爱国家爱民族分不开的（近现代中国更是如此，容后叙），而且更能引发听众的政治热情，譬如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的《芬兰颂》，芬兰人听了会热泪盈眶；斯美塔那（Bedoich Smetana）的交响诗《我

的祖国》(*Má Vlast*), 顾名思义, 这首更是如此。

然而, 时过境迁之后, 或从其他文化的立场来看(或听)的话, 是否政治效果仍然不变? 就我个人而言, 音乐确会引起激情, 但却不见得和政治有关。我听过《我的祖国》无数次, 虽然我也热爱捷克文化, 但却对《我的祖国》部分音乐无动于衷。我做过一个试验, 光听此曲最有名的唱片——1992年捷克籍的名指挥库布里克(Rafael Kubelik)回到阔别三十年的祖国与捷克爱乐交响乐团在布拉格五月音乐节演奏的实况录音, 觉得演奏热情有余, 但抒情味不足, 还比不上他早年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灌制的版本。最近买了一张这场音乐会的实况录像的VCD回来看, 却立刻受到气氛的感染而激动起来。

同样的音乐,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况中, 当然有不同的感受, 恐怕标题政治性极强的音乐也不例外。我久想写一篇论肖斯塔科维奇的文章, 但迟迟未动笔, 多少年来却发现自己对他的音乐的看法改变了不少, 甚至自相矛盾。以前, 我一直认为肖氏是20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 他的作品无论从内在或外在的观点, 都是政治上反极权的作品。他在《第十交响曲》中甚至用音乐“画出”一幅斯大林的形象, 并用自己的姓名字母化为音符与之对抗, 诚属音乐史上最伟大的见证。

在通俗中反讽的肖斯塔科维奇

我的以上观点, 当然受到那本回忆录(《见证》, *Testimony*)的影响; 据闻这本书的中译本在内地出版后, 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册。然而, 这本书最近已经被证明并非肖氏自己所述。一部分意见是真的, 另外的想法大多是该书作者假肖氏之口而发的主观议论。后来

我又从其他资料上发现肖氏生前并不那么勇敢,在斯大林面前更是畏首畏尾,否则怎么会一受批判,马上乖乖地写了一首《第五交响曲》,还特别题了词:“一个苏联艺术家献给他祖国人民的作品”云云。肖氏的题词是否出自真心,或是口是心非、根本在骗人?我们后人当然不得而知。但最具反讽意味的是,这首交响曲却成了肖氏所有交响曲中最脍炙人口(耳)的作品,其流行的程度远远超过他的《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而这两首作品却真的是为德军围攻下坚守城池的列宁格勒人民而写。

我曾将《第五交响曲》和《第七交响曲》做过比较,后者较前者冗长,第一乐章更长,那一段进行曲反复了几次,听来颇觉庸俗,不知当年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指挥此曲在美首演时作何感想?至少巴尔托克就受不了,甚至还在他的《交响协奏曲》中足足戏谑了一番。只有像伯恩斯坦这样的指挥家才能够化庸俗为神奇(他那张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唱片是实况录音,我有幸坐在听众席中)。第八就较第七成熟多了,因为它的标题并不那么明显,却更烘托出一种凛冽的气氛。我认为肖氏交响乐中有标题的作品——第二、三、七、十一,都是与革命或抗战有关——似乎比不上没有标题的作品;第二和第三更令我不忍卒听。唯一的例外是《第五交响曲》,这首作品虽无标题,献词却十分明显,听来(至少我听来)仍然甚有风格,第一乐章较《第七交响曲》更严谨也更有力量,而中间乐章以慢速度逐渐引至最后乐章的高潮(我听过的所有唱片中还是普列文[André Previn]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那张 RCA 出品的最能令人满意),甚为过瘾,好像一股闷气终于在最后爆发了出来。然而最后的一个乐章也最引人争议:到底表现的是苏联人民的精神胜利,还是闷气出尽后的一种空洞感——锣鼓齐鸣,振奋之余,又能作何感想?甚至奏得越响,听起来越空洞,我认为这才是肖氏伟大之

处——他的作曲技巧所带来的嘲讽和反讽的效果。

我认为肖斯塔科维奇不但是一个“反讽”作曲家,而且也是一个“通俗”作曲家,他更能在通俗中达到反讽的目的。他生前曾为不少电影作过配乐,其中不乏佳作,这一方面,他的成就仍较他的同辈和劲敌——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稍逊色。普氏为爱森斯坦的影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所作的配乐,至今已成音乐史上的经典;然而肖氏的芭蕾舞曲却较普氏的更通俗也更有讽刺性。普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辛德里拉》等芭蕾音乐都是古典的,而肖氏的芭蕾舞曲《黄金时代》却无奇不有,表面上在讽刺资本主义的腐败,但却大胆地把美国百老汇和好莱坞歌舞剧的曲子也改编了进去,那一首《二人饮茶》(*Tea for Two*),用的是爵士节奏,听来风趣之至,和其他部分形成强烈的对比,使我想到布莱希特的戏剧,因为布氏也喜欢用通俗的小曲穿插剧中,以达成间离效果。

沉重载道的中国新音乐

走笔至此,不禁从音乐的政治性想到音乐的写实性和社会性的问题。中国现代的作曲家,大批受到文学的影响,最关心的也是这些问题,而更重要的大前提则是音乐的“民族性”,好像认为音乐可以和文学一样振聋发聩,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出正义之声。这是值得仔细探讨的问题,恐非这篇杂感所能驾驭,这里只能做点随感式的“启发”工作。

20世纪初中国新音乐的兴起,受日本影响甚大,简谱即可能出自日本。后来受西洋音乐的熏陶,逐渐以五线谱作曲,但在技巧上似乎仍然脱离不了19世纪的渊源;19世纪的西方音乐可谓集数世纪之大成,也奠定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然而这个传统在20世纪初